

“一國兩制”文庫 No. 26

“一國兩制”文化與 澳門和諧社會研究

林園丁、容錦龍等 著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出版

“一國兩制”文庫 No. 26

“一國兩制”文化與 澳門和諧社會研究

林園丁、容錦龍 等 著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出版

“一國兩制”文化與澳門和諧社會研究

作 者：林園丁、容錦龍 等

責任編輯：庄真真

封面設計：蔣詠珊

電郵地址：CEUPDS@ipm.edu.mo

出 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印 刷：城市印刷廠有限公司

規 格：15.5cm×22cm

版 次：2011年12月第一版

印 數：1,000本

定 價：澳門幣50元

ISBN 978-99965-2-041-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課題組負責人：

林園丁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總署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

課題組成員：

容錦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總署技術員

鍾擁軍 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

張德榮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公職局顧問翻譯員、澳門大學
法學院訪問講師

陳冠群 華南理工大學澳門校友會副會長

編審：

楊允中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級研究員

許 昌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級研究員

姬朝遠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級研究員

目 錄

前言	1
第一章 “一國兩制”構想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底蘊	2
一、“一國兩制”構想的歷史背景	3
二、“一國兩制”構想的文化底蘊	11
第二章 和諧社會概念	20
一、對和諧概念的理解	20
二、社會的組成	23
三、社會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相互作用	30
四、和諧社會的構成要件	35
五、社會和諧的達致方式和手段	37
第三章 “一國兩制”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的相互關係	40
一、“一國兩制”文化	40
二、澳門社會狀況分析	45
三、和諧社會構建與民眾參與	48
四、中國文化道德價值觀	49
五、對澳門的啟示	51
六、“一國兩制”文化對構建澳門社會的影響	52
七、“一國兩制”文化對構建澳門和諧社會的貢獻	62
八、“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社會現狀分析	64
九、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比較	68

第四章 澳門的制度變遷	74
一、政治參與制度	74
二、社會制度	82
三、法律制度	84
第五章 澳門公共房屋政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影響	90
一、澳門房屋現況綜述	90
二、澳門土地資源的利用與發展	92
三、澳門房屋的社會定性	93
四、公共分配和社會公平	96
五、保障性住房的社會意義和對市場的影響	99
六、市場失靈與政府干預	101
七、小結	103
第六章 澳門的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	105
一、社會財富的分佈與再分配	105
二、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106
三、經濟單元發展與多元發展的危與機	110
四、對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期望	114
第七章 對澳門和諧社會建設的若干建議	120
一、成就和諧社會的幾個重要制度建設	120
二、建立軟性的約束力量	129
第八章 結論	132

前言

“一國兩制”在港、澳兩個特區實施已經超過十年的時間，兩特區都積累了各自的實踐經驗，在“一國兩制”逐漸形成為一種世上獨有的管治文化的時候，如何利用這種制度文化的優勢來構建和諧社會，突顯求同存異的社會共識，是本專項課題的研究重點。

“一國兩制”的歷史背景、內涵、文化底蘊以及港、澳地區實施“一國兩制”的現實環境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特區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利之處和不善之處，特別是正確處理既有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與內地生活方式(社會主義社會)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值得高度關注。構建和諧社會是澳門特區社會治理的目標之一，要達致和諧也必須不斷求變及探索，包括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方面的改變和不斷完善，“一國兩制”也是追求和諧的產物，通過港、澳地區實施“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經驗，驗證“一國兩制”的必然性和科學性，進而必然為和平統一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示範與參考。

由於澳門經濟急速發展，社會利益分配嚴重失衡，以及部分政策過分傾斜產生的不公平競爭，而政府未能採取及時有效控制手段，進而導致的深層次矛盾的出現，我們有必要找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制度改革是現行比較有效的手段)，為政府、市民提出“以經濟發展帶動改革，以改革達致和諧”的“和諧之道”。

第一章 “一國兩制”構想的 歷史背景與文化底蘊

“一國兩制”構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深深紮根於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中，繼承並弘揚了中華民族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理論結晶。中華文化是維繫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精神紐帶。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承襲了愛國主義、團結統一、“和為貴”、實事求是、自強不息等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譜寫了一曲弘揚民族魂，傳承了中華文化優良傳統的凱歌。探討中華文化與“一國兩制”構想的關係，對於增強在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具有重要意義。¹張雪嬌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歷史文化底蘊》一文中，指出鄧小平所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思想、“和合”思想及誠信原則的繼承、發展和超越，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底蘊，為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架起了一座引橋。²王秀玲從中華文化的視角闡述了“一國兩制”的文化基礎，通過海峽兩岸具有同源文化這一事實來闡明“一國兩制”的合理性、不可逆轉性以及實現中國完全統一中的重要作用。³劉本鋒則較全面的論述了中國西周、遼、清等朝代的統治者根據各自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等特點，在不同的範圍、不同程度地實行過“一國兩制”政策，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和創新精神。⁴郭曉光、樂雪飛等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着豐富的大一統思想，它自孔子首倡，經世代相承，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國家分裂的優良傳統。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理論，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大一統思想中追求統一、維護統一的思想精華，而且超越了傳統大一統思想中一般靠武力實現統一的模式，主張用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超越了傳統大一統思想中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思維模式，主張兩種社會制度共生並存，超越了傳統大一統思想中追求整齊劃一的思維模式，主張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實行尊重現實的政策，對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發揮了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⁵

構建和諧社會，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所追求的和諧思想一脈相承。和合思想所蘊涵的豁達、團結、包容、和諧等思想觀念，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理論依據和文化底蘊，“一國兩制”是和合之道的具體運用，是當前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傳統的“多元一體”的政治文化本質是由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和階級性所決定的。“一國兩制”是當代中國宣導的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政治選擇，它植根於中國文化沃土，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建構中華大文化的理念與傳統的“多元一體”的政治文化本質的合理內質相互貫通。

一、“一國兩制”構想的歷史背景

借鑒歷史，有助於人們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形成新的理論。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一球兩制”的全球戰略格局形成。在這一戰略格局下，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兩種制度之間的關係，不僅是資產階級學者，也是社會主義理論工作者必須回答的問題。從歷史上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處理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問題上，政策是不斷變化的。從邱吉爾的扼殺理論，到肯南的遏制戰略，再到50年代中期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戰略，西方國家一直希圖憑藉其強大的軍事或經濟實力，在全球範圍內戰勝並最終消滅社會主義。與這一過程相對應，積極而富有經驗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努力探索戰勝資本主義的策略。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最早提出和平共處的策略，用以指導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在這一策略的指導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長足進展。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的鼓舞下，二戰後一大批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而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在現實中依然向前發展。兩種制度在世界範圍內，一度達到過暫時勢力均衡，形成世界政治領域中的兩極格局。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競爭轉移到綜合國力的競爭上。

鄧小平先生敏銳的把握了這一變化趨勢，高瞻遠矚地指出：時代的主題已經由戰爭與革命轉變到和平與發展。從中國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來看，鄧小平先生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創新思維，

充分體現了鄧小平理論在世界歷史智慧中的光彩。人類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有利於指導現實和預測未來。恩格斯曾經說過：“科學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鄧小平非常重視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特別是對傳統制度文化的推陳出新。⁶鄧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不是偶然產生的，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他在總結歷史經驗、結合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提出的戰略決策。⁷

（一）“一國兩制”構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以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為價值取向的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性調整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二戰後，世界格局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期採取了相互對立、相互敵視的態度。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採取了遏制、封鎖、包圍的冷戰政策，與此同時，針對冷戰政策，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則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政策，如蘇聯同東歐國家成立的華沙條約組織等。

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則進入國際力量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面臨諸多矛盾，資本主義陣營在許多問題上也存在着磨擦。兩大陣營的矛盾與磨擦並未能帶來世界的和平，相反，則帶來了世界的更加動盪不安。一方面，在前蘇聯長期推行大國沙文主義，武裝干涉他國內政，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撕毀同中國的幾百個合同、協定，挑起中蘇邊疆衝突，侵犯中國珍寶島，出兵侵佔捷克斯洛伐克等行為引起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不滿與反抗，各國逐漸對蘇聯模式產生懷疑，甚至要求改變這種模式，50年代的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即是對該國蘇聯模式下造成的混亂局面的不滿，同時也是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不滿。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陣營裏，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美國長期推行其霸權主義，加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不斷受到革命風暴的衝擊，使得資本主義內部矛盾重重，逐漸發生分裂，歐洲各國對於美國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強，由此而引起的各種對立也越來越強，其中尤以法國對外推行的戴高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代表。與此同時，作

為兩個超級大國的前蘇聯和美國，在該時期的爭霸中，以爭奪為主，第二次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第三次中東戰爭等都確切地反映了兩大國間尖銳的矛盾。

因此在20世紀50、60年代整個世界的歷史背景就是戰爭與革命，世界各國都隨時準備着進入戰爭的狀態，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內地政府曾經決心“以武力解放台灣”，但經過與台灣、美國的長期較量後，中國內地政府卻逐漸摸索出一條新的統一道路，即“和平解放台灣”的道路。1956年6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宣佈；“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方，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同年10月，毛澤東主席指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1958年，在停止炮轟金門時，毛澤東主席又抓住時機撰寫了三告台灣同胞書：“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但是，由於處在當時“戰爭與革命”時代，加之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思維，美國的干涉，使得這種和平方式不可能實施，雖然和平方式的思路沒能得到台灣當局的回應，但是並不意味着放棄這種思想，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觀點，恰恰成為了鄧小平總設計師“一國兩制”思想理論的歷史的淵源。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60年代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之間更多的表現為對立，大的政治環境也是戰爭與衝突。對台灣的政策也傾向於武力解決，在這過程中美國對華政策推行的是“遏制並孤立”，長期的鬥爭經歷證明了武力這種方式的不可取性。隨着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一條可取的途徑，在這種思考過程中，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開始逐漸形成，最終成為了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方式。為了瞭解這個過程，需要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華政策進行一個較為全面的探究。

1. 美國的外交政策傳統及其政治文化根源

美國的外交政策歷來都是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鬥爭與統合中展開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共同構成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傳統，它們在

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內外環境下交替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理想主義是美國學者對美國政府奉行的一種外交政策的稱謂，它的最大特徵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看待國際關係，把維護其價值觀所認同的自由、民主、人權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這種理想主義傾向總是能夠得到美國多數民眾的理解和支持，究其根源，它符合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美國人歷來認為，美利堅民族是上帝的選民，它對人類的歷史發展和命運承擔着一種特殊的責任，負有把世界從苦海中拯救出來的使命。這種使命意識在價值層面上為美國政府推行理想主義外交政策提供了理性依據，使美國具有霸權主義性質的外交政策具備了順應天意、理直氣壯的道德“正當”性。

理想主義是美國的外交傳統之一，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並不總是那麼一目了然，這是因為從美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誕生之日起，現實主義就伴隨着理想主義同生共長，成為理想主義的平衡力量。現實主義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最主要的追求目標是國家的利益，並認為，由於世界是利益相互衝突的國家組成的，全球利益的和諧是不可能的。在現行的國際制度下，沒有一個中央權威來解決爭端、調解不同的利益，每個國家只能依靠實力和強權來實現外交政策的目標。究其根源，美國文化傳統中的務實精神和功利主義色彩，構成了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文化基礎。美國人理想式地把自己確定為上帝的選民，同時卻注重功利，以觀念和目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實用性作為成功的判斷標準。美國的外交決策正是這兩種彼此競爭的思想傾向權衡取捨的結果。當然，這兩種政策傾向的力量對比並非靜態，而是隨着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實力地位的改變而改變。一般來說，當國家實力相對較弱時，理想主義的分量相對少一些，現實的國家利益在對外決策中具有至高無上、壓倒一切的優先權；當國家實力上升後，理想主義成分就會明顯上升，體現民族認同的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往往超過其他因素而成為決策的指南。

2. 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性調整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形成產生積極影響

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精疲力竭，惟有美國一枝獨秀。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傾向隨着自身實力的增強而變得日益明顯，理想主義中的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更是成為政治生活中的經常性內容。新中國從誕生之日起便為美國所仇視。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和中美兩國戰場上兵戎相見，美國開始對中國推行“遏制並孤立”的政策。在美國出兵介入朝鮮半島內戰的同時，又悍然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宣佈台灣地位未定。在美國看來，中國大陸統一台灣再也不是中國內戰的必然結果，而是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組成部分。於是，台灣問題複雜化，即由中國的內部問題轉變為具有國際背景的以中美之間干涉與反干涉為主的問題。歷史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開始進行理性調整，不得不以較現實的態度來對待中美關係。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複雜：首先，美蘇實力差距迅速縮小，蘇聯軍事威脅的緊迫性超過了意識形態矛盾的重要性。其次，中蘇分裂和資本主義陣營出現的裂痕，使意識形態矛盾變得模糊不清，意識形態的分歧已經無法再作為區分戰略敵友的界線了。再次，美國侵越戰爭的失敗，使美國領悟到，不能把反對共產主義當做美國干預全球事務的基本原則，這場戰爭有悖於國家利益。在兩岸對峙、國家分裂，而美國又是造成這種對峙和分裂的主要國際因素的情況下，美國對華政策的理性調整，不僅改善了中美關係，同時又緩和了兩岸局勢，對大陸對台政策的適時調整以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其一，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客觀上有助於恢復中國大陸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大陸調整對台政策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外部環境。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把台灣當局逐出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案。但客觀上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對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連基辛格也承認：問題的實質在於，友好國家改變了立場。當美國對北京採取敵對態度的時候，他們害怕投票贊成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受到我們的某種懲罰。現在我們戲劇化地要跟北京和解，他們就不再怕這種懲罰了。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中

國的統一至關重要，它表明：中國政府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成為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的普遍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隨着國際活動空間的日趨廣闊，中國大陸方面逐漸在海峽兩岸關係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其二，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使中美關係正常化得以實現，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障礙。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後，中美兩國關係不斷改善。1972年，雙方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否定了1950年杜魯門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以及由此衍生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獨”等謬論，承認了美國多年來不願承認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客觀事實，從而解決了台灣的法律地位問題。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公佈“建交聯合公報”，宣佈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1982年中美經過反復談判又達成了第三個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解決了對台軍售這個中美建交談判時遺留未決解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加上國內海峽兩岸關係的變化和基於對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考慮，大陸對台方針政策作了歷史性調整。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建交聯合公報的當天，大陸領導人就在新聞發佈會上闡述了新的對台政策，第一次在正式公開場合沒有使用“一定要解決台灣”的提法，表達了和平統一的思想。1979年1月1日，鄧小平發表了題為“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的重要講話，明確指出中美建交對中國的和平統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79年1月30日，鄧小平在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解釋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立場時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的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這些都表明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已初現端倪，並在20世紀80年代正式形成，且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

（二）“一國兩制”構想形成的思想淵源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淵源。每個民族都有與政治行為直接相關的特定的政治文化定勢，這種定勢往往深入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心靈和行為習慣之中，成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會貫

穿於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並穩定地發揮作用。當然，任何傳統政治文化作用的發揮，都必須通過政治主體有意識地擇取、詮釋和轉換。傳統政治文化必須通過對現實人的支配和影響而獲得其規定性，而這種支配和影響又只能在現實政治主體的實踐活動中得以實現。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深受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影響和啟迪，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與實現祖國統一的政治實踐相結合，既為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機，也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和統一模式找到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1.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核心是實現祖國統一

這個思想集中體現了人們追求統一、反對分裂的文化意願，與傳統的中華“大一統”思想的理想模式相契合。

中華“大一統”思想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強烈的“中國意識”，它有兩個明顯的特徵：一是作為心理基礎的民族認同感，即每個社會成員都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在政治心理上形成了一種與國家命運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榮辱感和歸宿感。二是由民族認同感這一心理傾向發展而成的政治一體觀，強調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是一個整體，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分割。這種強烈的“中國意識”是使整個中華民族凝聚成一體的精神紐帶和思想基礎，也是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形成的重要文化基因。“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使傳統的民族認同感在祖國統一的問題上找到了現實的寄託。鄧小平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正是這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使他執著地追求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發出了中國“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錚錚誓言。1979年元旦發佈的《告台灣同胞書》情真意切地指出：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儘管歷史上有過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內部分爭，都不曾使我們的民族陷入長久分裂。近30年台灣同祖國的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意願的，決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係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務，現實地擺在我們大家面前，誰也不能回避，誰也不應回避。正因為具有這種強烈的民族歸宿感和歷史責任感，才能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思想，並以此為模式，以期成就祖國統一的宏圖大業。“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源於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與探索，而歷史的發展卻使香港、澳門先於台灣步入“一國兩制”的軌道，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傳統的民族認同感能超越時代，超越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以其巨大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使整個中華民族凝聚為一體。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使傳統的政治一體觀在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上得了合理的闡發。“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鄧小平用擲地有聲的語言，鄭重地宣告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立場。本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並不牽涉到國際法的主權概念，只是由於外國勢力干涉和台灣分裂勢力阻撓，致使兩岸分離狀態長期得不到解決，但絕不意味着海峽兩岸已分裂成兩個主權國家。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起，從來沒有容忍過所謂“台灣地位未定”、“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等分裂企圖，而是一貫堅持對台灣享有行使領土主權的權利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從未放棄過這一權利。20世紀60年代，這一權利主張主要表現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政治目標。此後，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特別是中美關係由緩和到建交，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島內的新變化，大陸對台灣行使領土主權的主張體現在“和平統一”並繼而發展成為在海峽兩岸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

2.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強調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中國統一

這個思想蘊含着對和諧、和平的追求與和而不同的價值觀，同傳統的中華“和合”精神相映照。

中國古代“大一統”社會培育了“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中國人常抱着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的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聞，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

“天人合一”的思維表現在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係上就是中華文化的“和合”精神，其基本內涵歸納起來有兩個要旨：一是追求和諧、和平，以和為價值標準治理國家，處理社會關係；二是強調這種和諧狀態不是靜態的和諧，而是在承認事物差異的基礎上，把性質各異的事物統一於一個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中華“和合”精神所包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成為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思想淵源。

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中國統一，體現了“和合”思想文化的時代價值。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成為牽動並影響其他各種矛盾和種種問題的兩大主題，建立一個比較穩定和共同發展的國際關係體系，已成為各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在新的時代主題下，實現祖國統一必須考慮到維護世界和平這一因素，大陸政府誠心誠意地希望並致力於推動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不僅如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具有超越時空的偉大意義，它的作用不僅局限於中國，也為世界各國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國兩制”統一模式與“和合”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相互貫通。關鍵是要找到和平統一中國的現實途徑。鄧小平明確指出，大陸社會主義與台灣三民主義誰也不好吞掉誰，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就是既要承認大陸與台灣存在着歷史上與現實上的差異，以及兩種制度本質對立和鬥爭，又要以一個中國為根本原則，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一球兩制”的時代背景下，創造性地提出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一國兩制”模式，這是對“和而不同”思想的現代運用和發展，對其內在價值的把握和提升。

二、“一國兩制”構想的文化底蘊

（一）大一統的思想

“一國兩制”從其更深層的文化背景來看，它與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它首先體現了中華文化追求統一的矢志不渝的信念。⁸

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是在部落戰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隨後的商周王朝不僅擴大了地域，而且使人民有了國家的概念，“統一”問題也隨之得到了強化，雖然在不同的時代，不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展開爭鬥和戰爭，但始終以“統一”為目的。春秋戰國時期動盪劇烈，周朝衰落，隨後有春秋五霸，戰國時有“七國爭雄”，最後秦始皇統一中國。秦漢之後三國鼎立，但不忘統一。南北朝的分裂，終有隋唐的統一。南宋金遼元的對峙，都希望入主中原，統一全國。明清兩代帝王不僅統一了全國，而且擴大了版圖，實現了各民族的融合，從